

# 1980年代中国城市雕塑 (连载之一)

## CHINA URBAN SCULPTURES IN THE 1980S (1)

文/戚家海

By Qi Jiaohai

### 第一章 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成立始末

作为首个国家级城市雕塑事业的领导机构，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的建立是中国雕塑事业发展史中的里程碑事件，其酝酿筹措的过程与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工程实施有着深层的联系。纪念堂雕塑工程的组织与创作，使一度遭受“冷遇”的中国雕塑界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雕塑与生俱来的纪念、宣传功能重新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并使之与日后重塑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诉求联系起来，为80年代中国城市雕塑事业的复兴提供了国家力量的支持，影响了新时期中国城市雕塑创作体制的形成。

#### 第一节 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工程的组织

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工程的组织，其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创作时间之短、任务之艰巨都是空前的，是继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后雕塑界的再次大集结。尽管当下学术界、雕塑界对纪念堂的雕塑作品本身以及雕塑工程的组织方式、创作方式，持有种种不同的看法甚至是疑义。但不容否认的是，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工程的创作点燃了雕塑走向室外的导火索，刘开渠、曾竹韶、盛杨等先生的“煽

动”，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室外雕塑之火在全国各地的迅速蔓延和熊熊燃烧积累了共识，做了组织与舆论准备。

#### 一、纪念堂雕塑工程的领导机构——毛主席纪念堂雕塑组

1976年9月9日，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晴天霹雳的噩耗通过广播电台迅速传遍全国，古老的中华大地再次被悲天恻地的气氛所笼罩。“为了永远纪念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教育和鼓舞工农兵和其他劳动群众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摘自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1976年10月8日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于1976年10月8日联合下发《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此《决定》吹响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毛主席纪念堂的集结号，大批的建筑界、美术界、医学界等各方面专家、干部迅速被抽调至北京，在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任办公室主任的“中央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简称国务院“九办”）（中央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当天，即决定从国务院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抽调干部和专家，由谷牧（国务院副总理）、顾明（国家计委副主任）、刘湘屏、黄树则、吴阶平、吴蔚然、李志绥、赵鹏飞、孙友余、韩伯平、肖秧、祁竣、党文林、陆达、魏福凯、甘子玉16人组成，谷牧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于1976年9月13日正式成立，设在北京市西城区西皇城根南街九号，名称叫“国务院第九办公室”，简称“九办”。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遗体保护的决策和一切组织措施、工作的落实。）领导下，由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李瑞环为党委书记兼总指挥的现场指挥部（现场指挥部全称为“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现场指挥部”，成立于1976年11月9日，由“中央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领导，李瑞环任党委书记兼总指挥，下设雕塑组。）具体负责，掀起了建设“天字一号工程”的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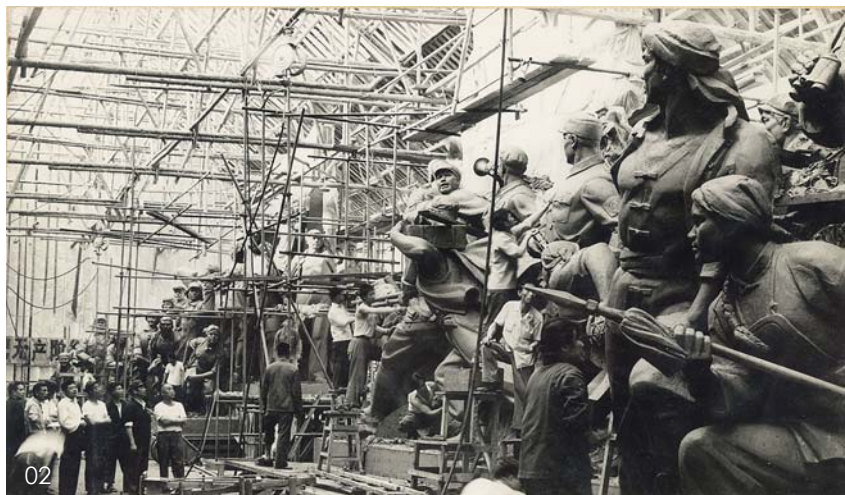


01 毛主席纪念堂北厅内《毛主席坐像》泥稿

以雕塑的形式纪念、歌颂毛泽东主席的丰功伟绩，是中央领导的共识，是国家意志的要求。为贯彻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国务院下达命令给文化部，由文化部负责从全国抽调雕塑家组成纪念馆雕塑组，经华国锋主席亲自批准成立。

雕塑组的人员组成，是文化部分两批从全国18个省市和部队抽调来的。第一批抽调是在1976年11月中旬，国务院领导听取盛杨先生的建议（盛杨先生在2008年4月16日接受久画廊记者采访时介绍，在第一批抽调雕塑家之前，中央美术学院收到文化部通知，派遣他和伍必端先生前往国务院，在明确雕塑任务后，他向有关领导提议从美术学院和创作机构抽调雕塑家，组成雕塑组，共同完成这一历史重任。）要求文化部向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等美术院校，以及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工厂、上海油画雕塑院等创作机构共八家单位下达调令，抽调了盛杨、叶毓山、白澜生、田金铎、孙家彬、陈启南、马改户、张叔瀛、沙士迪、李唐寿、王志强等二十多位雕塑家，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负责人盛杨先生担任组长，办公地点设在北京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主要负责北大厅内毛主席像设计，后增加了南北门外四座群雕方案设计任务（据笔者查阅有关修建纪念馆的回忆性文章等材料的考证，纪念馆的雕刻工程最初可能仅为北大厅的毛泽东主席像和建筑装饰雕刻，并没有考虑南北大门两侧的四座群像，而雕塑组刚成立时，人员全部投入室内毛主席像的设计，也可印证此点。南北门外的四座大型室外群雕，究竟是谁所提议的暂且不知。但“九办”主任谷牧曾明确指出：“纪念馆南北大门前的群雕一定要有”，“北门前的群雕要表现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南门前的群雕要表现我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的决心”）

第二批抽调在1977年2月底，中央领导审定通过纪念馆北大门两侧《丰功伟绩》群像、南大门两侧《继承遗志》群像的方案，为加快工期，3月上旬雕塑组经讨论决定提请国务院文化部再次发函。截至1977年4月，共有八十多位雕塑家再次被征调至雕塑组，至此参与毛主席纪念馆雕塑工程创作的人员达一百余人，（根据现有材料，1977年4月毛主席纪念馆雕塑组确切人数有两种说法：王志强先生在2003年12月接受《上海青年报》采访时指出人数是108人；孙家彬先生在2009年底接受《雕塑》杂志记者采访时指出人数为103人。后笔者向田金铎先生求证，田先生认为人数应该是108



02 位于北京白堆子轻工学院内的毛主席纪念馆群雕创作现场

03 顾问刘开渠先生、组长盛杨先生陪同谷牧副总理审查毛主席纪念馆群雕方案

人。）实现了继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后，中国雕塑界空前的大集结。雕塑组办公地点迁到北京西郊白堆子的轻工学院校园内，在操场上搭起了临时工作棚，安置四组群雕的放大泥稿。

作为重大主题的雕塑创作，纪念馆雕塑工程在谷牧、顾明、李瑞环等中央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按照中央下达的题材内容进行“命题式”创作，并在“九办”主持的每周例会上做汇报工作，接受华国锋、叶剑英、谷牧等中央领导的审查。根据“让工农兵看了满意”的中央指示，雕塑组的创作中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和业余雕塑家献计献策，注重听取各方面意见。为保证雕塑组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央领导指示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由李祯祥先生等人具体负责，担负雕塑家们的生活起居、材料供应、挑选模特等后勤工作，为纪念馆雕塑工程的按期完工提供了必要的后勤保障。

经过三个多月苦战，雕塑组出色地完成了四组大型群雕的泥塑放大任务。谷牧、李瑞环等同志和刘开渠先生一起审定了泥塑放大稿。方案审定后，从全国各地调来的翻模工人连夜翻模，后搬到纪念馆工地现场进行水泥铸造和剁斧等工作。1977年8月中旬雕塑工程全部完工。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计划采用花岗石雕凿的四组群雕，最终只得采用水泥拌细石和石英沙仿花岗石制成。1977年12月纪念馆工程现场指挥部致雕塑家的信中，明确指出四座群雕“由于创作和施工时间有限，目前暂用水泥仿花岗石制成”，“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第一阶段工程完成后，广泛征求意见，然后进一步修改提高，进行再创作……刻



04 1978年毛主席纪念堂雕塑修改小组部分成员合影（后排左起：田金铎、王卓予、王二生、李祯祥、王克庆、张叔赢、盛杨、韩福裕；前排左起：程允贤、王志强、潘鹤、张松鹤、刘开渠、曾竹韶、叶毓山）

成永久性的花岗石雕刻群像”（详见《毛主席纪念堂雕刻艺术工程资料图册》，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现场指挥部，1977年12月）。由此可见，室外群雕采用水泥仿花岗石只是权宜之计，仅是为了配合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一周年举行的纪念堂落成典礼。

按照中央的要求，完成纪念堂雕塑工程的雕塑家回到各地后，要“及时向所在地区的工农兵群众以及领导和专业同志征求意见，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底以前函告”（详见《毛主席纪念堂雕刻艺术工程资料图册》，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现场指挥部，1977年12月），为群像的修改提高做准备。同时谷牧副总理提议毛主席纪念堂雕塑组不解散，改称毛主席纪念堂雕塑修改小组，主要负责征集各地群众对纪念堂群雕的修改意见，考虑将其改为永久性材料的可行性，至此毛主席纪念堂雕塑组的使命终结。

毛主席纪念堂雕塑的组织形式，是国家意识高度主导下的室外雕塑创作模式，为80年代中国城市雕塑创作体制的确立提供了借鉴。而室外雕塑本身所蕴含的宣传教育功能，再次唤起中央领导的重视，特别是作为雕塑组顾问的刘开渠先生等人（据盛杨先生回忆，遭受“四人帮”严重打击的刘开渠先生，在恢复自由后即刻给国务院写信，希望能参加纪念堂雕塑工作创作，后雕塑组考虑到工作环境的恶劣，加上刘老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报有关领导同意后，聘其为雕塑组顾问，从雕塑理论上、处理方法上给予指导。）积极与有关领导沟通，为80年代中国城市雕塑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 二、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的雏形——毛主席纪念堂雕塑修改小组

毛主席纪念堂雕塑修改小组由刘开渠先生担任组长，盛杨、王克庆、李祯祥三位先生任副组长。修改小组成立后，在刘开渠先生带领下，分期赴西安、沈阳、上海、广州、重庆、北京等地征求纪念堂群雕修改意见，曾于1978年冬在上海油画雕塑院召开修改稿研讨会，并在上海美术馆做了展览。

修改小组并没有局限在征集毛主席纪念堂室外群雕的修改意见，按照谷牧、顾明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嘱咐，积极调查各地室外雕塑的基本情况，与各地有关领导和雕塑家共商如何发展中国雕塑等问题，探讨中国室外雕塑发展的可行性，为推动全国雕塑事业发展做准备。

受谷牧等中央领导的委派，1979年底毛主席纪念堂修改小组抽

调人员组成中国雕塑家赴欧考察团，前住意大利、法国考察雕塑发展状况。考察团由刘开渠先生任团长，盛杨先生任党委书记，团员有张松鹤、苏晖、潘鹤、田金铎、陈启南、王卓予、王二生、韩福裕等11人（此考察团中雕塑家共10人，另外一人为文化部指派的随团意大利语翻译。）此次欧洲之行，是由文化部组织并经国务院批准的，并拨付一万美金的考察经费。

考察团自1979年11月14日启程，12月17日返京，在为期三十天的时间里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那波里、彼得山达、卡拉拉和法国的巴黎等八个城市。在两国有关政府部门的精心安排下，考察团共参观了42个博物馆、20多个广场和纪念碑、10多个美术馆和展览、7个美术院校，还参观了大理石采石场、大理石制品厂、雕塑铸造厂和罗马文物修复院，并和部分艺术家座谈。意法两国遍立于建筑、广场、公园和街头巷尾的数目众多的大小纪念碑和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的装饰性雕塑和不计其数的室内雕塑，给中国雕塑家考察团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回国后编著的《雕林漫步》一书中，考察团详细记录了在意大利和法国的所见和心得。刘开渠先生在《有益的借鉴》一文中，特别强调了意法两国室外公共建设项目中，雕塑资金的来源和比例、雕塑家在城市规划中的地位以及与建筑师的配合等举措。他在文中还特别指出，意法两国政府注重每年利用一定的款额购买优秀作品的举措。刘开渠先生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方向、文艺政策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们党和政府领导文艺的方式也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但是某些行之有效的推动艺术繁荣的具体措施，是可资借鉴和参考的”（《有益的借鉴——代前言》，刘开渠等著，《雕林漫步》，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第6页）。

回国后的考察团将所拍的照片制作成幻灯片，向中央有关领导做了汇报并建议发展室外雕塑。同时以毛主席纪念堂雕塑修改小组的名义，由刘开渠先生亲自率队，赴全国各大城市为市级干部和雕塑家讲学，放映雕塑幻灯片，介绍欧洲雕塑，特别是室外雕塑的发展成果（图1-11），强调雕塑走向室外的必要性，以及室外雕塑对美化城市环境、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此次中国雕塑考察团，有几点值得我们关注：首先，考察团是在国务院的批准、支持下成行的，据田金铎先生回忆，中央不仅拨付考察经费，文化部还为考察团配备了随团意大利语翻译，这表明了中

央已明确支持发展雕塑事业；其次，此次考察是综合考察，不拘泥于写实风格，现代派雕塑也予以了介绍，随着报告会的开展以及《雕林漫步》书籍的热销，必然会推动日后中国雕塑创作观念和形式语言的解放；再次，考察团考察了意法两国雕塑家介入室外公共建设项目方面的政策，强调政府对发展雕塑事业的资金投入，为后来成立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制定规范室外雕塑发展的政策做了铺垫。

### 三、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工程的影响

发展室外雕塑特别是室外大型雕塑，没有政府政策的支持和财政的投入，仅仅依靠雕塑家自身的能力是无法实现的。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工程的组织，为雕塑界和中央领导创造了沟通交流的平台。据盛杨先生介绍，在纪念堂雕塑建造过程中，他们积极向谷牧、顾明等中央领导建议国家应重视室外大型雕塑的发展。修改小组成立后，刘开渠等先生更是经常向谷牧等领导介绍室外雕塑在纪念英雄人物、教育人民、美化环境等方面的功能，并以苏联等国室外雕塑的发展模式为例，强调室外雕塑的发展应由国家力量介入和支持。在1980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刘老在发言中特别强调雕塑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1980年中国美协第三次会员大会，作为中直代表的刘开渠、傅天仇、苏晖、王克庆等先生又向大会提出了《关于发展雕塑艺术事业的建议》。

经雕塑家特别是刘开渠、曾竹韶等老一辈雕塑家的不懈努力，终使中央领导对发展室外雕塑予以积极响应。1979年国家计委主任顾明召集刘开渠、潘鹤、田金铎、陈启南、王卓予等先生商谈发展室外雕塑的事业。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的谷牧同志（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谷牧率领建国后首次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的政府经济代表团，考察了法国、丹麦、比利时、联邦德国、瑞士五国。谷牧在考察中不仅看到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而且亲眼目睹了欧洲遍布大街小巷、建筑、广场和公园的室外雕塑，对他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中国的雕塑事业极为关心，不仅积极向周扬等中央有关领导建议，而且鼓励雕塑家走出去，探讨中国室外雕塑发展的可行性。1979年底中国雕塑家考察团赴意大利、法国考察，就是在他的直接关心下成行的。据田金铎先生介绍，谷牧副总理非常关心中国雕塑事业的发展，1979年11月的中国雕塑家考察团最初的名单中遗漏

了盛杨先生，谷牧知道后，专门指示有关部门将其增加进来。考察团出发前，谷牧等中央领导嘱咐他们要带回欧洲国家有关发展室外雕塑的政策性措施和方案，以便借鉴。1980年中宣部和文化部曾呼吁国家建委拨付一定比例的建筑费用，用以支持发展雕塑事业（《我们要做雕塑复兴的新一代》，杨美应，《美苑》，1980年第3期，第60页）。

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工程，特别是室外的四座大型群雕，点燃了雕塑家创作室外大型雕塑的欲望。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雕塑家们无不希望以自身的艺术创作为城市建设增光添彩。据马改户先生回忆，参与纪念堂雕塑创作的雕塑家回到各地后，纷纷向有关领导提议希望成立雕塑组或雕塑委员会，发展室外大型雕塑，以陕西为例，1979年8月以参加纪念堂雕塑工程的雕塑家为班底，陕西组建成立了陕西省雕塑院，成为该省审查大型室外雕塑方案的主要机构。率先迈出改革开放步伐的广东，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潘鹤先生等人的不懈推动下，广州、深圳、珠海等地纷纷建立了相关领导机构，室外雕塑在珠三角地区率先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雕塑家积极在国内重要的报纸、杂志发表文章（据笔者初步统计，1978年1月至1981年12月间，中国知网中收录的期刊中论及室外雕塑的文章有近30篇），为发展室外雕塑大造舆论。特别是1981年刘开渠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谈谈北京市规划问题》一文，提出了以雕塑美化城市和园林的规划问题，呼吁全国各地把室外雕塑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任务来实施。潘鹤先生发表在《美术》1981年第7期上的《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一文，全文从介绍国外室外雕塑的发展现状和中国古代雕塑的成就，分析了新中国以来雕塑的处境，最后发出中国雕塑“80年代代理应寄希望于室外广场”的号召。

毛主席纪念堂雕塑的艺术价值如何，雕塑工程的组织方式和创作方式是否合理，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笔者不想做评判。但不容否认的是，纪念堂室外群雕的兴建加速了中国雕塑走向室外的步伐，为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的建立和80年代中国室外雕塑的复兴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待续） （戚家海 中央美术学院2010届硕士生）

05 1979年9月，毛主席纪念堂雕塑领导小组第二次扩大会议合影。（后排：王志强、戴广文、程允贤、叶宗镐、王克庆、陈启南、田金铎、王卓予、钱绍武、冯一鸣等；前排：郭其祥、潘鹤、苏晖、尹积昌、张松鹤、刘开渠、曾竹韶、王二生、盛杨、张有明、韩富裕等）

